

对迁西境内的潘家口、喜峰口、三屯营蓟镇戚继光总兵府及青山关、榆木岭长城的实地考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潘家口的水下长城、雄奇山水,喜峰口的重山叠峦、险关要隘,青山关的逶迤长城、叠翠青山,以及总兵府的碑刻等等,都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会者一致认为,蓟镇镇府即“戚继光总兵府”极具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部分专家学者于会后联名向有关部门倡议:应尽快在三屯营原址上对主体建筑进行修复,这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承蓟镇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历史学界、文学界、考古学界都参加了讨论,可谓见仁见智,而且每个意见的根据对开拓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此外,蓟镇作为一处重要的明代历史遗迹,为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些学者也以新视角观察明代的历史问题,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为推进明史研究开辟了新局面。总之,这次研讨会不仅促进了明史研究工作,而且让沉寂多年的迁西县明代蓟镇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更有利于挖掘和开发迁西丰富的旅游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成燕)

##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 的环境基础’学术研讨会综述

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城乡市场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环境基础,不仅是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发展日臻成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核心话题。事实上,地理环境之于区域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影响,不单体现在作为长时段背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即便是市场结构本身亦可看作是一个构成全息社会图景的重要人文地理要素。因此,借助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讨区域城乡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或许具有了超越以往一般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学术意义。

西北地区面积广大,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特殊,具有农牧兼营、民族多样、聚落分散的地域特征,此间各种市场形态颇具特色,其结构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各种自然、人文环境因素不断影响着市场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中经验,可为当前西北地区城乡市场体系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例如张萍所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就属于近来这方面的探索之作。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10月23—25日在西安举办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环境基础”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43篇。

会议期间,除安排朱士光、辛德勇、吴松弟、许檀诸位教授做主题报告外,还围绕地理环境与区域市场结构演变之关系,区域市场结构空间演变的历史进程,区域交通、城市、人口、民族

与市场结构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城乡市场发展的典型个案分析,不同区域间市场结构的比较及相关区域历史地理学个案研究等六个专题展开。下面大致分三个方面对各专题加以综述。

一、区域市场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论地理环境对形成与完善城乡市场结构之基础作用——兼论中国西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认为,地理环境对西北地区城乡商贸市场构建的基础支撑作用全面而充分,既有自然环境的制约,也有人文环境的影响,在具体个案研究中应全面而中肯地作出分析。吴松弟(复旦大学)《近代北方口岸的开放及其贸易发展》从宏观角度对近代以来北方口岸的开放过程加以关注,指出这是引发口岸依托城市商贸大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论证当时中国北方绝大部分进出口贸易是通过沿海口岸完成的。

许檀(南开大学)《清代的归化城税关与西北边疆贸易》详细介绍前人少有提及的清代归化城税关问题,探讨税收征管制度的确立以及税额增长的历史过程,并认为归化城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汉蒙、边疆贸易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理转运枢纽作用。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羊毛市场》描述甘宁青地区各类羊毛市场的运作概况,分析指出在这一区域性产销体系中,存在着以水陆运输线为纽带,三个不同层级市场相互衔接构成的市场网络。李新贵(宁夏大学)《公元14至19世纪湟水流域城镇市场格局形成和演变》认为这一时期的区域市场运作和地理分布主要受中央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和当地的地理环境相适应。史红帅(陕西师范大学)《清代后期西方人在西宁地区的商贸活动及其影响研究——基于档案史料的考察》对西方人在西宁地区的商贸活动进行探讨,认为西方商人和洋行在清代西北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袁黎明(陕西师范大学)《唐代甘凉二州市场地位的转变及其环境因素》指出国家政策和地理区位是甘凉二州先后作为区域市场中心地位确立的关键,而唐后期的气候干旱化趋势则是两者地位发生嬗变的重要因子。

二、区域社会与市场结构演变互动关系以及个案分析。辛德勇(北京大学)《论细柳仓与潞邑仓》对西汉长安附近两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仓储地理位置作了缜密考辨,以更为广阔的时空作为讨论背景,结合交通状况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当时两仓在物资转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军事和经济地理意义。张萍(陕西师范大学)《城镇·市场·环境:清至民国陕北长城内外的市镇重组与经济整合》指出,以往单纯从城址分布、兴衰角度所提取的“环境指示”信息,还应置于对区域社会各要素全面转型的内涵式分析中加以考量,如强调城址分布的军事意义、移民开发带来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址兴衰演替现象。樊如森(复旦大学)《近代西北与华北的市场联系——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中心》梳理了近代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线的西北和华北市场贸易联系演进的历史轨迹,认为交通状况是联系两区贸易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同时指出天津具有引导西北、华北外向型市场网络的龙头地位。

胡铁球(宁夏大学)《“歇家”、城堡、寺院与藏边地区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指出作为商业经营模式的“歇家”,在藏区城镇以及贸易中心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刘景纯(陕西师范大学)《清代晋陕商人与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市场的发展》探讨山陕商人与区域城镇市场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山陕商人也是推动乡土市场繁荣的积极力量。赵岩(东北师范大学)《汉简所见河西四郡的市场的几个问题》复原河西四郡设立后张掖郡西部形

成居延和麟得两个市场中心,指出以往认为依托置来设市的说法没有足够证据,并在区域社会的背景下讨论了节日对当地市场消费产生的影响。阎东凯(陕西师范大学)《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新疆天山北路商业城镇研究——以奇台为中心》细致梳理了做为新疆北路商业中心的奇台自清朝中叶以降商品贸易兴盛发展的历史轨迹,指出民国中期区域交通地理条件的改变是导致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杨方方(陕西师范大学)《浅述北宋开拓熙河过程中秦州的市场发展》指出在宋朝开发陇右熙河的过程中,也为当地出现朝贡、茶马贸易以及榷场、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极大地推动了秦州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三、不同区域市场结构的比较以及其他历史地理学专题研究。以往学界对唐代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研究多着眼于经济制度层面,郑显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视野下唐代西北地区商业管理》则从法律视角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系统阐述国家对市场机构、商人行为的法律约束和行政管理形式,认为由于唐代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经济地理位置,使得该区域的商业管理与中原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独特性。周喜峰(黑龙江大学)《明代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市场贸易比较研究》认为,明代西北和东北虽同属边疆地区,但由于政治地理形势的不同,使得市场贸易的类型存在较大差异。

安介生(复旦大学)《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历史时期山陕地域关系研究之一》提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可将秦晋之间的地域关系上升至地域共同体的高度来认识,其根来自历史渊源、地域毗邻、交通往来、政区建置、人口迁移、文化共同性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桑广书(浙江师范大学)《西汉以来黑河流域绿洲演变》对甘肃黑河流域历史时期流域范围内绿洲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空间复原。胡凡(黑龙江大学)《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关于河套问题的议论》对明代中期中央、地方官员如何处置河套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史料爬梳。张晓虹(复旦大学)《隐藏的城市: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晚清西安》通过《基督教先驱报》记者 Francis Henry Nichols 所著 *Through Hidden Shensi* (New York, 1902; 其中译本《穿越神秘的陕西》,史红帅译,三秦出版社,2009),考察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西安城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成一农(中国社会科学院)《明清时期甘肃东部城市形态研究》从城市形态基础、历史渊源、内外部结构以及影响因素角度,对明清甘肃东部城市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席会东(北京大学)《清代厅制初探》总结清代各类厅的出现和设立过程,指出厅的建置是清代疆域扩展和深化统一的行政手段,厅制的施行起到了地域整合、民族融合、区域开发的作用。路伟东(复旦大学)《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认为同治以前,陕西回民仅占全省人口的一成五左右,甘肃回民仅占全省人口的三成左右,合计回民仅占两省总人口的二成五左右,总数估计不超过 800 万。徐建平(复旦大学)《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对民国时期政府调整插花地的背景以及陕西潼关和河南阌乡之间的划界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潘威(陕西师范大学)《1650—1950 年渭河下游河道形态演化过程及驱动因素研究》利用 GIS 技术对渭河下游河道形态的演化以及自然、人文影响进行了细致探讨。

总之,本次研讨会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拓展了学界对历史时期区域城乡市场结构演变及其地理基础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从中既反映了近年来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包括历史商业地理学在内的历史地理学其他各分支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思路,相信会议的成功举办会有助于相关学科不断向前推进。